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3.007

记忆为了遗忘:沃德·贾斯特《遗忘》 中的记忆书写^①

张诗苑,杨金才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沃德·贾斯特虽以“遗忘”为题,却以积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雾气重重的索姆河搭建了特殊的记忆之场,从而将当下后9·11时代置于更大的历史景深之中,以历史的眼光反思当下弥漫的暴力复仇情绪。主人公托马斯因其画家身份而成为一名独特的记忆者,绘画作为记忆的媒介促使托马斯关注他者继而分享记忆,探寻建立记忆共同体的可能,以期打破记忆与遗忘的对立,在记忆、宽恕与遗忘的纠葛中厘清对错,实现和解。

关键词:《遗忘》;记忆;遗忘;宽恕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3-0049-08

沃德·贾斯特(Ward Just, 1935-)的小说《遗忘》(*Forgetfulness*, 2006)主要讲述了在后9·11复仇情绪充斥的大背景下,画家托马斯如何面对妻子的山中遇害以及对凶手恐怖分子的暴力审讯,如何取舍复仇与宽恕,疗伤前行的故事。查尔斯(Ron Charles)认为贾斯特用平静却有利的笔触,展现了后9·11时代里迪金森笔下“巨痛过后,肃穆降临/神经庄重安放宛如坟墓”的静穆之感^①。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详述了恐怖主义弥漫的当下,《遗忘》中展现的政治密谋(hugger-mugger),局外人形象,以及沉重的失去与悲伤^②。巴尼塔(Georgiana Banita)则着眼于伦理,强调了小说中观察他者与选择遗忘的伦理行为^③。如果将《遗忘》置于主流的后9·11小说研究中,可以发现不同类别的研究与相异的评价标准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融合。例如,卡普兰(Ann Kaplan)、维斯鲁伊斯(Kristiaan Versluys)等学者关注创伤书

写;格雷(Richard Gray)、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与基布尔(Arin Keeble)在家庭化、私人化叙事方面展开激烈争论^④。如巴尼塔所言,《遗忘》是在家庭与国际,个人与政治的双重维度中书写后9·11社会^⑤。在一战、西班牙内战、肯尼迪遇刺等历史事件关照下,作者以一次发生在法国乡村个人的“9·11事件”反思了当下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灾难重现与暴力复仇。而在各类庞杂的事件中穿针引线的正是托马斯的记忆。作者以积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雾气重重的索姆河、哈乐黛的蓝调音乐……搭建了一个又一个记忆之场,记忆游走在历史的缝隙之间,促使记忆者以更宏大的眼光看待现实的社会灾难与个人伤害。同时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记忆与遗忘在一场谋杀与一次审讯中展现出奇特的辩证关系,二者并非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通过宽恕的桥梁过渡与

① 收稿日期:2018-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WW00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WWA001)

作者简介:张诗苑(1993-),女,辽宁盘锦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Charles, Ron. "Grief Interrupted", *Washington Post*. 2006-09-0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8/31/AR2006083101136.html>.

② Updike, John. "Hugger-Mugger", *New Yorker*. 2006, 82(29).

③ Banita, Georgiana. *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2, p9.

④ Keeble, Arin. *The 9/11 Novel, Trauma, Politics, and Identity*.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2014, p17.

⑤ Banita, Georgiana. *Plotting Justice: Narrative Ethics and Literary Culture after 9/11*.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2, p8.

转化,以期在暴力与灾难中厘清对错,寻求和解。

一 特殊的记忆场:历史景深中的后9·11时代

托马斯因其特殊的画家身份被招募为CIA的秘密雇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完成转移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弗朗西斯科的任务后,情报泄露,导致弗朗西斯科遇害。托马斯愧疚与痛心交织,选择隐居在比利牛斯山旁边的小村子里。本意试图疗伤忘却,却不想走进了一个特殊的记忆之场,使其在皑皑白雪间记住更多。“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是指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层含义同时存在,程度不同^①。其作为历史的对立面出现,并非用来反对历史,而是在历史渐渐淡出民众意识的背景下,把历史重新唤回记忆之中。正如阿斯曼所解释的那样,记忆之场是一个失去的或被破坏的生活关联崩裂的碎块。但它的历史并没有过去,仍保存着物质上的残留物,从而成为故事的元素^②。托马斯正是在记忆场中讲故事的人,用鲜活深情的记忆弥补了历史的断裂与遗忘,架起与现实沟通的桥梁。

一如诺拉所言,正是下述往复运动构建起了记忆的堡垒:“那些脱离历史运动的片段,如今又被送回到历史运动中。它们不再全然鲜活,也并非完全死亡,就像贝壳在记忆海洋退潮后栖息在岸边。”^③看似平静肃穆的比利牛斯山实则散落着许许多多记忆的贝壳。这一法国和西班牙的天然国界促成了西班牙内战在当下历史进程中的返场,于自然风景之上投射了一个回忆空间。

他在楼下那间朝南面向峡谷的房间工作,地势上升直到道路中断,积雪覆盖的山顶高耸。这是一条许多个世纪以来走私犯所行之路,也是一条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弗拉西斯科·戈雅战争时,流亡者所行之路。西班牙内战期间又有大

量难民涌入。托马斯说,一天结束时他从画架向窗外望去,可以听到行军的脚步,伤员压抑的哭号,皮革和武器摩擦的咯吱声。在悲惨的1937到1938年间,数千人逃离加泰罗尼亚,主要定居在阿基坦。一些人仍然活着,现已年迈,他们的后代散布在法国南部,一个西班牙的移民社群。甚至弗朗哥过世也不能使他们回归故土,因为太多东西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要去宽恕。宽恕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当托马斯画画的时候常常想起西班牙难民,因为他自己也是一类流亡者,一个错置的人^④。

如西塞罗所说:“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⑤地点不仅可以成为记忆的载体,将回忆固定,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可以穿过遗忘的迷雾,向藏匿于深处的历史伸出手去。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前奏曲,宗教信仰、政治理想与爱国情怀的碰撞让其中的是非对错扑朔迷离,但大批生命的丧生与流离失所却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之痛。镇压行动中的遇难人数至今不明,战争最后几个月内50多万人逃亡海外,永久移民约有17万人^⑥。内战结束后,弗朗哥政权延续了近40年,直到1975年这位独裁者去世。比利牛斯山这一天然的记忆之场,为托马斯创造了回忆的氛围,记忆的责任使他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一如他记得为弗朗西斯科作画时,老人悲伤的神色,“战争30年前就结束了,但是伤口至今还在流血”^⑦。每当有人前来拜访,托马斯都要请他们欣赏窗前的景色,他会说,“苦难之路,难民们将会发现,除了没有杀戮之外,这里并没有比他们舍弃的地方好。”^⑧

小说中特殊的记忆之场并不只有比利牛斯山。托马斯的邻居格兰杰和他一样都是背景神秘,“鞋里装了石头”的人。用官方的话来说,格

①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②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页。

③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④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35. (小说引文为笔者翻译,下同,不再另作标明。)

⑤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

⑥斯坦利·佩恩:《西班牙内战》,胡萌琦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

⑦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00.

⑧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36.

兰杰是一战时的英国逃兵。据他回忆,1916年7月2日清晨,经历了昨日最惨烈的一战,他从洞里爬出来,避开脚下的尸体和人体碎片,麻木地行走在无人的战场上,直到逃离。索姆河战役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次战役,4个月间双方伤亡130多万人,7月1日更是英军战争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天。格兰杰的身体、一个受到战争创伤的士兵的身体充当了托马斯记忆的媒介,使他不只记得“一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这一教科书式的符号,还记住了战场上弥漫着的珍珠色雾气和浓烈的鱼腥味,记住了格兰杰的沉默孤僻,记住了夕阳下明亮如草坪的台球桌旁,老朋友保持军人的坐姿,手覆在脸上,一动不动。因为保有这样的记忆,当格兰杰的侄女维多利亚愤怒地宣称自己的叔叔为家族耻辱时,托马斯淡淡地回答道:“他也只是尽力向自己的过去求生罢了。”^①

在旁观审讯杀害自己妻子的恐怖分子之后,托马斯走进了另一处记忆之场,位于蒂耶普瓦勒镇的索姆河战役纪念碑。“站在拱顶下,他被名字包围,名字太多太多,以至于它们如果是雨滴的话,将会是一场倾盆大雨。”^②托马斯看到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出来:

并不是所有他们看到的都会被记住。当然,那些墓地会,一排又一排的石碑,许许多多的国籍。如果他们够细心的话,老师会给学生们介绍这数百万人是怎样死的:枪杀、手榴弹、炸弹、刺刀、毒气、肉搏,在春天的雨季里,步兵陷入泥潭消失,痢疾、肺炎、坏疽、心脏病、中风,随处可见。精神崩溃像流行病一样蔓延。世界大战是一场激烈的挣扎、灵魂的挣扎、文明的挣扎,同样的文明,仅仅是被语言和习俗区分。经历过的人没有完全神智正常回来的。对于胜利者,再残酷的复仇也不为过;对于失败者,再

深的痛苦也不足以形容。战争标榜的是屠宰场的价值观,没有任何东西能为它正名,即使30年后德国人跃跃欲试。很难说这些学生们在他们1916索姆河战役之旅中都记住了什么。^③

或许托马斯和利奥塔意见一致:“纪念碑是再现的形式,而再现是为记忆减负,实际上是遗忘的策略。”^④但是在另一方面,由坟墓、纪念碑等营造的记忆之场同样意味着人们开始在一片遗忘的风景中标志出纪念之地并保存它的痕迹。随着幸存的受害者渐渐离世,对于在他们身上施加的罪行的回忆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固定^⑤。纪念碑铭刻了战争的史实,格兰杰个人对一战的真实记忆亦经由托马斯得以延续,托马斯时常感慨没有孩子的遗憾,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亦是记忆传承的断裂?

比利牛斯山、蒂耶普瓦勒纪念碑作为记忆之场,是特定历史片段从历史运动中脱离后的重返,而记忆之场之所以召回关于西班牙内战与索姆河战役的历史片段,意在于更大的历史景深中反思后9·11时代的暴力行径。历史是冰冷而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但记忆却是充满温度且难以割舍的主观情感^⑥。“冷历史”与“暖记忆”于记忆场中碰撞出的火花,理应燃起我们对当下的反思:弗朗西斯科遇害后,伯纳德向托马斯保证道,“我们会算账的”^⑦。托马斯曾感慨,这位美国朋友生活在一个旧账必须算清的世界,否则就会带来无法忍受的混乱。而热衷于台球的格兰杰在回答为何美国自1936年以后无人获得三颗星锦标赛冠军时说:“太多的战争经验,太少的耐心。”^⑧9·11之后,愤怒、复仇情绪在美国大肆蔓延;电视上不间断的伊拉克战争报道,在9·11袭击中失明的美国人在咖啡馆里滋事,维多利亚驳斥托马斯对反恐战争的异议:“这是美国的战争,是世界的战

①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37.

②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264.

③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p271-272.

④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8页。

⑤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页。

⑥朴玉:《承载历史真实的文学想象——论〈愤怒〉中的历史记忆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

⑦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07.

⑧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57.

争。那些不同意的国家太目光短浅了,尤其是法国。他们害怕直面未来,他们害怕历史重演,所以想让时间静止。”^①然而,身处如此特殊的记忆场中,不得不让我们相信,历史确实会、也一直在重演。一如本雅明的历史天使眼前的景象: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暴力与恐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我们在记忆海洋退潮后捡拾贝壳时会发现,相同的灾难重复一遍又一遍,时间流逝,伤口依旧血流不止。而记忆之场存在的根本理由正是让时间停滞,使人暂时停止遗忘,让事情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②。记忆之场提醒我们,有些事人们一旦学会了去回忆它,就不需要再去重复。

二 独特的记忆者:分享记忆与建立记忆共同体的可能

托马斯是典型的洛克式主体,后者抛弃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种无时间性的哲学前提,认为主体主要是由回忆来决定。由此,个体的身份认同便产生于个体历时维度中对自己作为同一自我的认识^③:“意识^④可以延展至很久以前,将历时遥远的存在和行为与当下的同一人连结起来……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当下正在思考的人才能整合自己,即现在与过去都拥有同一个自我。”^⑤可见记忆中包含着一个连续的自我,其不仅存在于时间之中,而且能够穿越时间的流变,指向当下与未来^⑥。因此强大的记忆能力使托马斯成为特殊的记忆者,丰富的记忆造就了他多元的身份认同,从而使其在国家主义情绪充斥的后9·11时代得以拥有异于旁人的清醒与宽容。

托马斯曾深情地将自己的记忆比作一幅流动的水彩画。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以至于其记忆可以用世界各地的火车站做索引。他选择隐居法国乡村,却依旧对威斯康星州的家乡小镇念念不忘。

同时,托马斯还是历史记忆责任的承担者,索姆河战役、西班牙内战、肯尼迪遇刺……曾经的暴行如用复用羊皮纸般誊写在他的记忆深处。如诺拉所言,“人们从记忆的归属感中找回身份的原则和秘密,而这种归属感反过来会牵涉一切。”^⑦托马斯的归属感不局限于某时某地,而是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气度,指引着他当下的作为。记忆的跨国性促成其身份认同的多元性,因此无论在国家抑或个人的冲突纷争面前,他都没有被当下的愤怒、复仇情绪裹挟,取而代之的是客观、清醒、包容的抽离感。反恐战争上法国拒绝与美国合作的态度,因9·11袭击而失明的美国人在法国咖啡馆里滋事,同样面对去世的家人时,巴格达夫妇的嚎啕痛哭与阿灵顿公墓的肃穆自持……托马斯都给予了理解。维多利亚认为托马斯过于不动声色以至于内心冷漠,一如她不理解为什么托马斯要选择离开祖国,生活在陌生人之间,自愿地做一个孤儿。但是当一个人保有对历史和战争最真实可怖的记忆,对朋友爱人最温暖真挚的回忆时,他对眼前的是非纷争是不会妄下定论的。记忆不是直接告诉它的接受者他应该做什么,而是他是谁。交织着历史、灾难、道德、乡愁与关爱的记忆使托马斯成为一名特殊的记忆者,而记忆搭建的桥梁亦将供他走向更多的未知。

托马斯作为记忆者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记忆媒介的与众不同。托马斯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肖像画画家,而画笔恰恰是营造气氛的绝佳工具。在朋友、爱人去世后,曾经的肖像画变成了回忆的激发者,托马斯甚至常常忘记了人与画的距离,将两者合二为一。他回忆起为弗朗西斯科作画时,“颜料涂抹得像西班牙人身上的负担一样重,一如他的怀疑,他许许多多的失望,他的抱负,他对西班牙理想病态的爱。”^⑧女友凯伦和妻子弗拉莱特的肖像画亦直抵人心到令人落泪。作为记忆的

①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27.

②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③刘海婷:《记忆、身份认同与文学演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④洛克所强调的“意识”(consciousness)作为个体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实则是人的回忆能力,或记忆的一种功能。

⑤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9, pp324-325.

⑥Poole, Ross. “Memory, Responsibility, and Identity”, *Social Research*, 2008, 75(1).

⑦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⑧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00.

媒介,图像的力量来自于它们不可控制的情绪潜能。与文本相反,它可以沉默地完全地封闭自己,或者比任何一个文本都滔滔不绝^①。因此一个悲伤的西班牙人会触及一个民族理想与自由沉浮的痛苦往事,那幅似乎能在凯伦体内生长肖像画诉说着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人心灵的创伤与不安,而弗拉莱特温柔充满同情的面容则是托马斯远离世事纷争的港湾。肖像画作为媒介,连结的是他者的面容与对这个人鲜活且充满热度的记忆,代表了他者被理解与包容了的异质性^②,而这恰恰赋予了托马斯观察他者的本能与亲近他者的动力。正如他和拜厄特的不谋而合——肖像画在某种程度上即为自画像,“你总会面对一张脸,但是技巧是赋予这张脸声音。当你这样做时,一幅肖像画就诞生了,同时画中还有一个故事。”^③托马斯一直强调,画家的目光要看到皮肤之下的内容,这样才能让陌生人在他的画布上展现生命,即使是十五分钟的熟人,一系列的快照。陌生人是他的职业。

由特殊记忆与绘画媒介带来的多元身份认同和对陌生人的亲近使托马斯,这一独特的记忆者,在面对杀害妻子的凶手尤瑟夫时,没有选择暴力复仇,而是尝试通过分享记忆来了解他者。托马斯为尤瑟夫画了一张素描,而这张脸早已在他的记忆里,“当你足够了解它,看到它的表情变化时,你会发现这是一张非常普通的脸,它会变得和你自己的脸一样熟悉,甚至更熟悉,除非你一生都在照镜子。”^④一如巴尼塔将托马斯为凶手画像的举动称之为伦理观看,这的确会使人联想起列维纳斯关于他者面孔(face)的伦理学:面对他者

赤裸面孔的召唤,自我有义务为他者生命承担绝对责任。托马斯在此迈出了走近他者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在弗拉莱特肖像画的注视下,尤瑟夫亦在接受着他者生命的质询。颤栗的脚步刚刚落下,托马斯紧接着又令人吃惊且动容地选择了与尤瑟夫分享记忆,试图拉近二人的距离。从弗拉莱特的年轻梦想,自己的绘画之路,到肯尼迪遇刺的创伤记忆,再到对西班牙人的亏欠……托马斯打开了自己记忆的箱子,把它真实地展现在尤瑟夫面前。事实上,无论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框架下,还是阿斯曼的交流记忆与马各利特道德见证人的讨论中,分享记忆都至关重要^⑤。分享记忆使我们学会如何记忆,如何在记忆中接受我们的过去,形成自我意识^⑥。也是我们尝试了解他者,并与其构成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代表着对共同回忆的期待,对自我认知的修正。但这种开放包容的行为却是我们未履行的义务^⑦。可当托马斯开始实践这陌生的义务,尝试用记忆进行彼此连结时,却发现记忆共同体的建立十分艰难。尤瑟夫虽然开口讲述事情经过,但对托马斯的坦诚相待并未共情,亦无悔意,两人之间依旧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正如哈布瓦赫提醒道,“人们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的圈子的观点联系起来。”^⑧即个人私密记忆往往受制于集体记忆的框架,继而在分享记忆时强加给他人。布思(James Booth)认为记忆共同体的诞生必须有政治身份的联合作为根基^⑨。而马各利特则直接在伦理层面解构了建立记忆共同体的可能,转而追求道德共

①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7页。

②Byatt, A.S. *Portraits in Fiction*. London: Vintage, 2002, p87.

③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61.

④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230.

⑤哈布瓦赫认为个体记忆与社会环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就无法对个体记忆进行思考;而扬·阿斯曼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细化为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后者指的是社会层面上,集体的成员通过交流与日常接触建立起来的记忆,其承载者是个体,存在和延续的手段是口传,具有时间上的限制。具体可参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strid Erll, Angser Nunning ed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8. 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则区分共享的记忆(shared memory)和共同的记忆(common memory),强调共享的记忆需要内部之间的关联,融合并调整着记忆者的不同视角,建立在记忆的劳动分工基础上。

⑥Campell, Sue. *Our Faithfulness to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

⑦Campell, Sue. *Our Faithfulness to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

⑧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⑨Booth, James. “Communities of Memory: On Identity, Memory, and Deb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9, 93(2).

同体的建设^①。另一方面,记忆分享者亦要考虑他者公开拒绝建立联系,拒绝承认和其他者的相似性,或者没有意愿加入共同体的情况。可见记忆共同体的建设困难重重。尽管列维纳斯明知他者为终不可解的深渊,却依旧奋不顾身地心系神圣。但托马斯毕竟不是圣人,在分享记忆失败的情况下,怒火一时压倒了赤裸面孔所传达的“不得杀人”的戒令,使他拿起了刑仗。但是紧急关头,可预见的未来记忆又使他超越了愤怒:“他对弗拉莱特和摩洛哥人的记忆将交织在一起,达到完美的平衡。每次他画肖像时,皮革撞击骨骼的声音,骨骼碎裂的声音,摩洛哥人摔倒时的惨叫将在耳边回响。沾着血的破碎皮肤,一动不动慢慢死去的身体也会在眼前浮现。”^②托马斯拒绝这样的记忆,最终放下刑仗,另寻出路。

托马斯作为一名独特的记忆者,有勇气有责任心去与他者分享记忆,尝试走近他者。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给我们一个虚妄的皆大欢喜的答复,因为有限的共同记忆终究不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稳定剂,救赎之路困难重重。但倘若没有如此胸襟坦荡的尝试,只是囿于个人记忆一隅,或孤芳自赏,或暗自神伤,那么人们更将没办法走出记忆的牢笼,实现和解。

三 记忆为了遗忘:宽恕与分量极重的忘却

记忆与遗忘总是如影随形,正如小说以“遗忘”为题,却用托马斯的回忆串联起整个故事,记忆与遗忘是这部小说中着力展现的两个主题。除了特殊记忆场对历史灾难的纪念,《遗忘》还展现了另一种方向完全不同的记忆形式:对过去错误、罪行的耿耿于怀,怀恨在心。一如当下弥漫的暴力复仇情绪,在9·11中失明的美国人在咖啡馆里滋事,宣泄对不公命运的愤怒,以及维多利亚对

格兰杰的仇视,即使这位饱受战争创伤的叔叔已经去世,却依旧受到侄女的怨恨与唾弃,依旧是“这个家庭的恐怖分子”^③。在某种程度上,仇恨和复仇心让记忆力变得敏锐。而与此同时,书中还存在另一种相反的走出历史困境的尝试——遗忘。在妻子遇害后,因不堪忍受丧妻之痛与目睹酷刑的记忆之苦,托马斯主动选择遗忘,试图躲在一些温暖怀旧的记忆里,做自己的囚徒与判官。一如他对命运多舛的爵士乐歌手哈乐黛的惺惺相惜,“她故意地或不经意地将记忆和遗忘达到一个平衡。如果她记住了所有事,那么她可能就不会生存下来,就不会唱歌。”^④但对于托马斯而言,效果并不理想。他曾两次几近忘却,可当旧事重提,好像陌生人无声地闯进他的领地,与记忆纠缠不休,又重新占据了他的思想。

纪念与怀恨在心的拉锯和托马斯在遗忘中的挣扎实则是后9·11背景下人类社会的记忆与忘却间抉择的缩影。无论记忆还是遗忘,都旨在走出历史创伤的困境。正如二战后马各利特的父母面对犹太同胞被屠杀的惨剧时的争论:母亲认为,如今对犹太人来说唯一令人尊敬的角色便是组成记忆共同体——成为灵魂的烛火,始终为那些逝去的人燃烧^⑤。而父亲却反驳道:“对任何人来说,仅仅为了保存对死者的记忆而活是十分可怕的前景……应建立一个主要面向未来、回应当下的共同体,而不是被一堆坟墓统治着。”^⑥二人不同的态度即为记忆与遗忘在灾难面前的实践形式,从以色列建国、为巩固欧洲和平重建西德,到弗朗哥去世,西班牙从专制精神中诞生民主,无疑都在一开始采取了遗忘的策略,专注于未来,却又在重重矛盾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集体开启记忆转向。至此,曾经代表着复兴与融合,在面向现代化的文化导向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遗忘策略,现在成为了否认和掩盖的同义词。相反,一度消极

①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7.

②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246.

③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41.

④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304.

⑤Assmann, Aleida. *To Remember or to Forget: Which Way Out of a Shared History of Violence*. Aleida Assmann, Linda Shortt, eds. *Mem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54.

⑥Assmann, Aleida. *To Remember or to Forget: Which Way Out of a Shared History of Violence*. Aleida Assmann, Linda Shortt, eds. *Mem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55.

地与固守过去、仇恨、复仇、分离相连的记忆,如今被重新评价为一项疗救的、伦理的义务^①。而在当下后9·11恐怖主义泛滥的时代,小说《遗忘》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将记忆与遗忘从对立的两极中解放出来,发现了二者之间奇特的辩证关系,既强调记忆的道德责任,也尝试遗忘和解。此处的遗忘并非上述政治抉择中的禁言与沉默,而是指向遗忘背后更加鲜血淋漓的价值选择——宽恕,而这也是当代哲人如马各利特、利科、德里达等在面对记忆与遗忘时所思考的问题。

托马斯对遗忘与宽恕也有着小心翼翼且模棱两可的思考,“健忘症是现代社会的诅咒,或者救赎,取决于你依据旧约还是新约。宽恕是健忘症的结果。”^②而在与安东尼聊天时,托马斯又矢口否认遗忘会带来宽恕,转而默认了安东尼“要保持绝佳的记忆力,遗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看法。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则对遗忘与宽恕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在他看来,宽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清除(blotting out)罪恶,将其彻底擦除、绝对遗忘;二是遮盖(covering up)罪恶,不再计较,但不予遗忘^③。而后者从概念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都优于前者,因为只有上帝既能宽恕又能遗忘,而遮盖罪恶在纠正错误方面也更具价值。因此,在第二种形式下,宽恕是转变个人态度、克服愤怒和复仇的有意识的决定,是基于不再计较罪恶而非遗忘罪恶^④。可见,简单的遗忘不是真正的宽恕。但作为决定的宽恕可以间接地带来遗忘:“宽恕使人放弃对过去错误的耿耿于怀,从而最终忘记它,或忘记它曾经对自己很重要。因而

这样的遗忘在道德、伦理上都分量极重。”^⑤正如“for-give”和“for-get”两个词所透露出来的那样,只有先给予,之后才能获得。由于未能真正选择宽恕,托马斯最终难抵痛苦过后内心的风平浪静。

如托马斯所言:“宽恕是渎神的。”其之所以难以迈出宽恕这一步,是因为宽恕是施害者与受害者合力达成的结果,只有当施害者选择悔过时才有意义^⑥。然而在后9·11的时代背景下,偏见、敌意、仇视、暴力审讯、“恐怖分子”的论断……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尤瑟夫的不合作远非因为其不知悔改那么简单。处于特殊记忆场的托马斯深知其背后的政治纠葛,因而也不愿再开始一段暴力报复恶性循环的人际关系。就像托马斯一心渴望忘掉狰狞可怖的现实,专心于自己的绘画。其所寻求的遗忘背后实则是宽恕的召唤,只是他尚不敢揭开这层面纱。马各利特提醒道,只有选择宽恕这个过程的决定是自觉的,最终实现宽恕的结果和遗忘一样不受控制,因此并不能得到保证^⑦。而作者贾斯特则告诉我们,即使是由我们掌控的出发点亦荆棘密布,苦难重重。贾斯特虽以“遗忘”为题,却拒绝给我们虚妄的承诺,遗忘并非痛苦记忆的出口,每个人都必须经过宽恕的割舍与锤炼。

如利科(Paul Ricoeur)所言,如果遗忘可以通过宽恕被合理地激发,那么它将不是在罪恶面前沉默,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没有愤怒的方式发声。这样的宣言将不再是戒律和命令,而是一种祈愿^⑧,是为了和平需要尝试并检验(tried-and-tested)的

① Assmann, Aleida. *To Remember or to Forget: Which Way Out of a Shared History of Violence*. Aleida Assmann, Linda Shortt, eds. *Mem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61.

② Just, Ward. *Forgetfulne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p140.

③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9.

④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02.

⑤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3.

⑥ 对于宽恕的条件与界限,学界的争议颇多。例如德里达认为宽恕的真正含义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纯粹的宽恕是绝对的,超越一切计算、刑罚、司法的赦免,即便犯罪者不悔过,也不请求饶恕。而阿伦特、亚凯勒维奇等则认为宽恕是有界限和需要补充的。具体可参张宁《德里达的“宽恕”思想》,《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同时对于宽恕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学内涵,德里达亦与努瑟鲍姆观点不同,前者认为不存在作为交易的宽恕,而后者则从中得出相反的(transactional forgiveness)结论。具体可参见 Martha C. Nussbaum, *Anger and Forgive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⑦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05.

⑧ Ricoeur, Paul.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athleen Blamey,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456.

解决办法^①。《遗忘》正是在不断接近与表达这样的心愿。从置身于纪念人类共同历史灾难的记忆场中反思当下,到分享记忆走近他者,到尝试宽恕与遗忘,作者将“遗忘”与“记忆”从僵化的两极中解放出来,展现了记忆与遗忘之间奇特的辩证关系:记忆为了遗忘,从而指向最终的和解。记忆与遗忘都具有疗救的功能,在实践上,二者几乎不互相排斥^②。重要的是去做,去接近,去尝试。

结语

一场谋杀,一次审讯,揭露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纠葛不休的复杂关系。菲利普·罗斯所言的“记忆为了遗忘”(remember to forget)实则强调了记忆与遗忘两个部分:先记忆,继而通过宽恕,实现遗忘与和解。例如,在基督教的忏悔中,罪孽被列举和诉说后得到牧师的赦免。在弗洛伊德的心理

治疗中,通过记忆将沉重的过去抬升至意识层面,然后得以舍弃。同样,在后9·11时代,沃德·贾斯特用一位独特的记忆者带领我们在特殊的记忆场中穿梭,思考记忆如何关照当下与未来的人类社会。提醒人们以道德责任承担起对历史灾难的记忆,吸取教训,停止伤害复仇的暴力循环。分享记忆是我们尚未履行的义务,即使面对陌生的他者,亦要为了实现和解而尝试建立记忆共同体^③。因人性道德而秉承的记忆,促使人们面对罪恶时有勇气超越复仇,选择宽恕,继而拥有坦坦荡荡的遗忘与和解的可能。然而,遗忘绝非暴力环境下安全可靠的出口,正如文末托马斯亦未实现真正的解脱。我们仍需思考遗忘是否会带来双方的卸负,全新的开始是否真的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其背后所蕴含的和解与制怒精神都值得当今社会反思。

Remember to Forget: Memory Writing in *Forgetfulness* by Ward Just

ZHANG Shi-yuan & YANG Jin-c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ough Ward Just named his novel as *Forgetfulness*, he also used the snow-covered Pyrenees Mountains and the foggy Somme River to create various sites of memory (lieux de mémoire). In this way, he put the post 9/11 era in a broad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minding people to remember with human's common morality. The protagonist Thomas becomes a special memory-individual for his artist identity. Painting as a medium of memory inspires Thomas to care about the Other and share his memory,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to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of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is violent world, is not the opposite pole against remembering, but a difficult but possible attempt, with the spirit of forgiveness, to try and test for the ultimate reconciliation.

Key words: *Forgetfulness*; memory; forgetting; forgiveness

(责任校对 刘兰霞)

^①Assmann, Aleida. *To Remember or to Forget: Which Way Out of a Shared History of Violence*. Aleida Assmann, Linda Shortt, eds. *Mem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68.

^②Assmann, Aleida. *To Remember or to Forget: Which Way Out of a Shared History of Violence*. Aleida Assmann, Linda Shortt, eds. *Mem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57.

^③殷燕:《困在文化夹缝中的“他者”》,《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